

行医琐记

[葡] 费尔南多·纳莫拉 著

李宝钧 赵强 丁晓航 译



**RETALHOS
DA VIDA
DE UM MÉDICO**

I 552.4

2

·葡萄牙文学丛书·

行医琐记

[葡] 费尔南多·纳莫拉 著
李宝钧 赵强 丁晓航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FERNANDO NAMORA
RETALHOS DA VIDA DE UM
MÉDICO
Composto e Impresso nas Oficinas
Graficas da Livraria Bertrand

本书根据贝尔德兰书店 1978 年版译

葡萄牙文学丛书

行 医 琐 记

[葡]费尔南多·纳莫拉 著

李宝钧 赵 强 丁晓航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〇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 插页 273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ISBN 7-5059-1646-7/I·1124 定价(平): 7.35 元

ISBN 7-5059-1647-5/I·1125 定价(精): 13.00 元

乡村的普遍性

（第一部 序言）

—

● 费尔南多·纳莫拉在当今文化界虽然年青，但却已是众多著名医生兼大作家中的佼佼者了。对于不甚了解其作品的读者而言，阅读一下手头这本书，就足以发现他那表面似苦涩，然而内心却洋溢着乐趣的深刻文学个性，因为这一切富有人情味；阅读此书还会发现他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观察事物的勇气及如何将其浓厚的创作欲贯穿到这一勇气中。他采用明快、直捷的写作风格，刻画出他的心为之紧系的大自然景物：微风、暴雨、火焰和飞翔的鸟儿。

关于医生从事文学创作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不少人已作过评论，我本人在谈到某些西班牙当代文学大师时，也曾写过一些文章，分析这一现象的可能的成因。如皮奥·巴罗哈。他是大夫，投身文学后行医。另外还有一些医学大师，如诺沃亚·桑托或拉福拉。他们在行医或做研究工作的同时，也从事崇高的文学创作。

二

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有其意义。文学同医学常常相结合，也有其意义。只要读纳莫拉的书就足可理会其中的意义。有些人把周围的生活弃置脑后，因为内心只顾自家生命，而常常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纳莫拉毫无僵化思想，他不卖弄学问，也不被教条束缚为“木乃伊”。他在评价自己的学识和专业水平时，总是很谦虚。本着这种态度，对乡村中无数患有各种疾病的病人，他细心观察和慎重诊断。由于事关人命，所以必须观察敏锐，诊断正确。为缓解病人的病情，或因创作的冲动所驱使，纳莫拉渴望写出自己的不安和忧虑，于是伟大的作家犹如一枝含苞待放的花蕾，一到春天就自然绽开了。费尔南多·纳莫拉就是这样成为作家的。

纳莫拉因在乡间行医，其事迹变得尤为典型。给我们留下文学作品的大多数医生却不在此例。所以，本书就更值得一评。

三

都市里医生的生活过于乏味，因为他以一种异常单调的状态下工作。据说人的疼痛到处都是一样的。但是，医务工作的根本点不在于单纯镇痛治病，而在于与之紧密相联的环境。根据理论治疗疾病，这是任何人数月内就能学会的二加二等于四的问题。但医学的重要性在于巧妙地揭示病因的秘密，不少病因确实出乎意料，其中，有些情况取决于病人的性格，而更多的则取决于环境。那么，大都市里的这一环境虽然外表复杂，但实质却很粗略和雷同，因此是单调贫乏的。一名乍到城里的农民面对一切茫然不知所措，心想他可能永远无法“识破”这个巨大而喧闹的“迷宫”的“秘密”。但是，只要找到引至“迷宫”秘密处的关键，通

常只需要几天功夫,就足可使该城象世界上所有大城市那样有条不紊,异常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获知其它地方同这里一样,其复杂性也是相同的。我们常发觉那些闻名于世的伟人,全世界的上层人物以及巴黎、伦敦或纽约的英雄们在乡下人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人。但是,一经接触,就不难发现,他们都是最普通和平常的人。在医学界走红的大夫、为上层社会调解纠纷的律师,尽管他们摆出“先生”的架子,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斥为既没文化、又缺德的“伪君子”。

在乡村生活中还有另一面。那里,一切显得简单不复杂。但是,它却永远富有新意、扣人心弦,令人目瞪口呆。我曾在其它场合讲过唯一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是各个国家典型的地区性的事物,无论是其外表,还是其实质。举例说吧,漂亮的女人,世界上各地都有,但不常见。而纯朴、未上过学、衣着褴褛的农妇却到处可见。我们且把她当葡萄牙或西班牙人,那地方仍保留着古老的传统的习俗。那些习俗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正因为常见;而不常见的,即趋消亡。从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规律。从表面上看,农民们为谋生整日奔波,生活单调乏味,而实际上,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内涵远比城市人——犹如杯中水,尽管是过滤的,香郁的——深沉得多。乡里的生活周而复始,永不止息。

四

在那些村寨里,村民们称本书的作者为“唐费尔南多”。令人奇怪的是,村民很少直呼医生的姓名,而是叫唐费尔南多、唐胡安或唐克里索斯托莫等名字来称呼他们。这就证明了我以前说过的话:农村的医生被称作“大夫”,是一种象征性的称呼,就象民间传说、小说故事或宗教寓言短剧中的“天使”、“魔鬼”、“叛逆

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称呼，而不是具体的指一个有名有姓、有身份证、有官阶的公民。

“唐费尔南多”的名声越来越响，终有一天城里的人也会知晓，也许会被称作“唐费尔南多·纳莫拉”。“唐费尔南多”有其独特的个性，与城里的其他医生迥然不同。在农村行医的那种充满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得到了“唐费尔南多”“大夫”这样的尊称，“唐费尔南多”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形象，一个栩栩如生的伟大象征。这一活的象征经历了人生的普遍的各方面，阅历了痛苦和不幸，爱恋和仇恨，卑微和高尚，不义和热诚，各种感情痛苦的模式。但他没有城里的贵夫人的苦恼、银行家的无聊或女打字员的妖艳。城里人大都只眷恋家庭，生活奢侈但精神空虚，电影院门前的那极为虚假的广告上的主角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曾说过，大城市的医生，就象大城市里的忏悔的神甫那样，他整天听到的就是痛苦或罪孽，尽管这种痛苦或罪孽显而易见是精心编造的。乡村的大夫或神甫却不是这样。请读一读这本书中的那些精彩的章节，它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唐费尔南多”是怎样乐此不疲地走村串户为村民解除病痛的。这些篇章所描写的一切，即使是显得过份自然主义的描写，却无不引起普遍的共鸣。

五

这部书是纳莫拉用他的美丽的母语写成的。勿容置疑，这是作品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所在。这部书若用我们的西班牙语写成，肯定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一位令人崇拜的西班牙人皮拉尔·贝拉斯克斯·奎斯塔斯，重新对作品的场景进行了勾勒、润色、粘结，就象对一件无可考察的青铜器的浅雕一样，因为这不

需要文字解释。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情节（一部分情况除外，当然这部分情节也很精彩，只是对治疗情节描写得太细了）都具有古典作品那种永恒的感情。我与本书的作者只见过一面，当时，他坐在一家医院的一间阶梯教室的最高处，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一部悲剧作品。他有天赋，善于在每件事物——无论是新还是旧——上找到人类永恒的本性。“不管在什么地方，要生活就要有追求，就要奋斗。只有这样，生活才有价值。”他是这么写的，毫无疑问也是这么想的。他的这一人生哲理使得他迷恋上葡萄牙的村庄，葡萄牙北方的村庄绿树成荫，农民勤劳能干；南方的村庄，坐落在万里平川上，“西班牙的风”轻拂着村庄，黑夜、雨水、树木、鸽群，就象所有不朽的悲剧作品那样，衬托着作品中的主人公，在许多情节上，甚至给人以喧宾夺主之感。

就这样，费尔南多·纳莫拉写成了这部描写永恒而又有代表性的小世界全貌佳作。

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

1954年于托莱多

费尔南多·纳莫拉作品中的 疾病与写作手法

(第二部 序言)

健康不大适合作小说的素材,疾病本身也同样如此。然而,从健康到疾病之间这段令人迷惘的过程中,却可以源源不断地找到写作素材。不论结局如何,小说中总要展示人们保持健康、免遭疾病困扰的愿望。就作者的愿望而言,人人都应当长生不死,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总是事与愿违,前景渺茫。

让我们大家都健康常在。如果这能作为一项最低标准的常规,真的能被当作写作素材,适用于精神错乱和其他疾病的话,我们也就满足了,别无所求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写作激情,不过是疯人的梦想,也许这就是纯粹的写作,为写作而写作,毫无意义。身兼作家和医生二职的费尔南多·纳莫拉的创作思路,使得他无意拘泥于把永保健康仅仅当作一种梦想,或把精神错乱当作梦魇。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的写作领域。这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几乎忠实地继承了古典主义的虚构描述手法。对他来说,写作素材并不限于疾病本身,而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整个疾病世界的、及其精神实质的迷人的故事。只有从属于作者本人和他所处文学时代的、深信人类价值必胜的看问题的角度来衡量,才能理解这种既迷人又奇特的写作手法。然而,这些篇章尽管奇特,却都在情理之中。在所有章节里,我们都能感

受到,疾病的阴影不仅存在,而且具有足够的力量摧毁按照人道主义标准衡量的、理想的健康状况。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是一种更深意义的真谛,它们极少能逃过那些从事一项事业、从不间断地深入研究其内在属性的人的眼睛。

尽管在疾病的王国里,人们不断地受到困扰,但在费尔南多·纳莫拉的作品中,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作者要揭开的是最后一道面具。这使他能够体验和证实,一个人患上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却仍抱有求生的一线希望的复杂感情。就写作本身而言,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敢于面对疾病,承认疾病的危害,另一种则更为常见,那就是回避矛盾,不敢正视疾病。但是,在费尔南多·纳莫拉的作品中,作者一方面在疾病已经形成、病情尚不明朗时,描写人们对健康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刻意向作为局外人的读者展示有关主人公的可怕故事。这对难以调和、却又不可分割的矛盾始终交织在一起。在第一方面,寻求健康是显而易见的。连最粗心的读者都能发现,费尔南多·纳莫拉是通过他的中篇、短篇和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和他本人,带着一种生离死别和无法否认的脆弱本性所亲身经历的人身痛苦来写作的。用他的话来说,他往日的的生活,始终伴随着“痛苦的海洋”,因而,他力图向人们揭示生活丑陋的本来面目。对作者来说,生活就象是一种不断繁衍、令人乏味的怪物,因此,他在他的短篇小说、自传体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筑起了道道屏障,试图阻止这种怪物。然而,这些屏障却形同虚设,徒劳无功。在这些屏障后面,人们总是很容易地揭示出一个陷入不可名状的惊恐之中的人,一个受可怕的疾病缠身的人,并通过这些彻底地揭示出人世神秘的混乱状态。很早以前,费尔南多·纳莫拉就领教了这个弱肉强食的、被一种可怖的癌细胞所侵蚀的人类世界。产生这种癌细胞的原因,是社会

的不公正和不幸。总之，接触疾病世界并身临其境，使得他特别憎恨人类生活条件的脆弱及其自身的懦弱，这只能使他对这种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由来已久的伤痕。早在少年时代，费尔南多·纳莫拉就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对社会寄予厚望的人。他选择了作家的职业，向人们展示自己那尚不引人注意、或者说是受人排斥的才学。他希望获得人们的承认。后来，他成为一名乡村医生，每天都在同别人的疾苦、以及他本人在能力和声誉方面面临的挑战作着若明若暗的斗争。与此同时，另一种对他来说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即作为作家、证明自己价值的斗争也已展开。但是毋庸置疑，如果费尔南多·纳莫拉没有亲身体验他作为医生的作用和局限；如果他不具有作为社会中一份子的良知，没有扎根于大众之中，就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在无数读者眼中成为一个始终受到读者青睐的、成功地把文学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典型作家。

生活中，最令人悲叹的是人世间无穷无尽的苦难。费尔南多·纳莫拉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隐藏的、令人伤感而又怪诞的、甚至是可怕的内心世界，一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神父和医生身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作品中，既看不到唯美主义的痕迹，也找不到一段纯自然主义的描写：他试图解除病人身体上、或精神上显而易见的病痛。人们也许会认为，作为医生兼作家，一下就把秘密揭开了，不足为奇。而事实上，费尔南多·纳莫拉是作为作家，而不是作为医生向我们展示疾病和痛苦的，这当中必然有风险。

是作者本人在描写疾病和痛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比歇斯朵夫关于死亡的理论更明亮的指示灯。在这位医生看来，歇斯朵夫的论点过于绝对，因而不适用：事实上，就象人们做各种事情都带有盲目性一样，医生治病也带有盲目性。这是一种双重意

义上的盲目性,有时它是宽仁的,人们事后发现虚惊一场,对疾病施行手术和治疗是不必要的;有时它是致命的,到头来,医生最终确信在他与疾病之间只存在着外在的联系,而感到束手无策”。由于这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矛盾,费尔南多·纳莫拉笔下的许多人物,以及他们的儿女们都忍受着悲伤和内心冲突。这使他们具有人性,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医生和疾病之间的难以沟通的屏障被打破了。书中的这些始终寻求摆脱疾病的英雄们(或懦夫们)并不能得到满足。尽管人们本能地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而医生作为自己所演这场戏中的受害者,也深信这一点。总的来说,费尔南多·纳莫拉笔下的关键人物,具有持久的代表性。但由于自身的戏剧性变化,他们往往不能坚持到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戏剧性——由其性质决定难免失误,比他在长篇小说《一个乔装打扮的人》和《星期日下午》中描写的更有深度。因为在那两篇中,作者毫不留情地、恰如其份地刻画的是医生的形象,更确切地说,是他这位医生——作家双重身份的表面特征。

在我们当中,费尔南多·纳莫拉比任何其他人都善于把超越个人小圈子的社会喜剧和人间喜剧的模式加以提炼,使之变成人世间的准则。正象神父和法官一样,医生很自然要带着文明社会的良好道德,分享钱财、特权和荣耀。根据这种道德观念,这三个方面都是命中注定了的。忐忑不安的自我认识,揭露在这个世界中被认为是固有的追逐这三样东西的闹剧,意味着要冒被掩埋起来的危险,去动摇一座殿堂的柱子。尽管这不是纳莫拉作品更深刻的意图,但由于它敢于怀疑在不文明的秩序还有赖以存在的支柱和同谋时,是否会存在着医疗与健康的条件,它却在他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一名医生越是带着高尚的人道主义思想深入到这种秩序中,且不说作者本人也属于这种秩序的一部份,他的尝试和成功

就越值得称道。但是,如我们不能从我们自身做起,对充斥现实生活的谎言和伪装保持高度的识别能力,那么文学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作者并不忌讳描写疾病所特有的、令人厌恶的可怖场面。故事始终以疾病为中心,以疾病为主线,情节的发展总是令人惊骇不已。作者的目的是让他所塑造的人物,或给这些人物治病并对他们负责的医生,暴露在最残酷无情的环境中,以便人们在失去真诚和基本的人性时,使尔虞我诈的社会现象暴露无遗。他有理由让他笔下的一些人物直言不讳,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补偿。对作者本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同时也在暴露他自身的不安和懦弱。

不论是他笔下的主人公还是他本人,都不对别人所给予的力量,以及他们每个人自身的力量抱有幻想。作为医生的纳莫拉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连他本人都半信半疑的角色。他是既带着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感和热望,又带着悲愤和苦恼扮演这个角色的。我们已经谈论过他的行医琐记第一集,一部类似他作为乡村医生的回忆录中的戏剧表现手法。应该说,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特别是在他的行医琐记第二集中,始终充满着戏剧性。在这集中,我们看到这个昔日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在他扮演的保护健康、拯救灵魂的魔术师般的角色中,变得城府越来越深。读者很容易看到这种情景:在他富于创造性的生活中,那种既当医生又当作家的矛盾关系将解体。作为作者和演员,介于疾病的现实世界和创作的假象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这并不意味着他把现实抛到九霄云外,而恰恰是为了从梦幻中苏醒过来,重新回到现实中。因此,作者除了描写疾病外,还描写了不同于他本人亲身经历的、前后并不衔接的奇特故事。尽管不是他所亲身经历的,行医却始

终占有特殊的位置,尽管是不情愿的,这位医生同疾病的姻缘关系却持续了很久很久,到头来他变得遍体鳞伤,并且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残痕。在《九月的对话》或《诡秘的人》中,作者除安排了其它一些情节外,还刻意描写了作为医生所怀有的悬念和留下的印象。通过这些描写,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疾病世界向我们提供一种选择余地,那就是从根本上采用写实手法,但与此同时,也包括在种种伪装下,对个人和社会进行描写。在这些伪装后面,富翁们、有权有势的人和健康的人享受的人道主义特权,掩盖了普遍的贫困现象。

与写实手法相反的是夸张的写作手法,即以戏剧性和表面文章代替现实。

早在青年时代,费尔南多·纳莫拉就能够感触到在贪欲和吝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中,人际关系所包含的矫揉造作,他本人也是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分子。这些人眼界狭小,唯恐重新坠入他们刚刚得以抽身的、平民百姓的“地狱”中。“上层人物”的光彩夺目,使他们头晕目眩,利欲熏心。然而,不能随心所欲,并极力掩饰欲望,在这个小天地中被奉为信条。有关虚伪人物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一本更有针对性的长篇小说的主题,实际上也始终贯穿于他的这部作品中。费尔南多·纳莫拉对这个小天地了如指掌,他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属于这个惴惴不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怯懦、虚荣、肤浅和脆弱,他们在葡萄牙现实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此同时,他们很容易因袭陈规,喜欢之乎者也。他们靠自己的资质和才干,麻木不仁地生活着,并乐于这样生活。

在这样的社会中,背景材料可以任意编造,致使那些掌握其中奥秘的人,变得越发寡廉鲜耻,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

·费尔南多·纳莫拉不会改变他的风格，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一条并非完美无缺的道路。他在对虚假世界的探索中，开辟出了一条坚实的通道。在这个世界中，农民阶层始终被人遗忘，他们由于无知和与可鄙的资产阶级的命运不相干，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自身的和谐、和平淡无奇的风光，使得葡萄牙农村人具有一种坚毅的品格，给童年时代的纳莫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记忆，并赋予他识别这种品质的热望，不管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梦幻中的，这种热望始终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尽管由于血缘关系，由于他扎根于乡土之中，费尔南多·纳莫拉的气质同这些农民十分接近，但却不能把他看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自比农民，或更确切地说，自比土生土长的乡下人。这并不是由于他见风使舵，赶时髦。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投身于文学运动，他发表了一部题为《土地》的诗集，他的名字同文学运动密不可分。人们也许会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在卖弄风情，然而，事实上，这是他双重个性的象征，一种典型的个性特征。对他来说，真实性就在于始终同土地打交道，不管是亲身经历的，还是虚构的。他家祖祖辈辈都同这块土地打交道，后来，由于他的家族渴望出人头地，才使他最终彻底地脱离了这块土地。

《琐记》作者的奇特经历，在二、三十年代葡萄牙社会中相当普遍。当时的葡萄牙社会，正明显地开始从酷似中世纪的乡村模式中走来。处在青年时代，人们特别容易受到城市的冲击，容易感情冲动，无的放矢。由于这个世界上，人们在感情上老死不相往来，却总要逢场作戏，加以矫饰，心灵上容易受到腐蚀，所不同的是作者由此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一种抛弃农村的过快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难以控制的疾病，归咎于不佳的城市状况，这座城市表面上鼓噪不安，而实质上却死一般的寂静。作者在后来的作品《孤城中》，带着发自内心的忧伤，对这种城市状况

作了描写。

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展现出来的，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怀有强烈的怨愤，同时又随时可以淡化它。他们多是昔日他所熟悉的那种怀有思乡情感的纯朴、自然的人。由于虚伪的、令他们惊叹不已的外界环境的腐蚀和诱惑，他们只能通过玩把戏和装模作样来取得社会地位、尊严和荣耀。在费尔南多·纳莫拉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我们已经领悟到的、他作为人道主义者的乐观主义，与显而易见的、不断滋生痛苦的世界之间的相反相成的矛盾。这是一种对充满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世界十分热爱，而又不能善始善终的矛盾。一个人似乎未经别人，未经富有的朋友或成就辉煌的资产阶级的认可，就无法真正确立自己的人格。在这里，我们触到了一种脆弱感情的要害。这种脆弱感情，在作者《一个乔装打扮的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一切似乎表明，只要存在这种神秘莫测的情况，他所拥有的，使得他不断增加信心的正确决断都不可能持久，他的成功就不可能是决定性的。等级观念，给书中羞怯的、土生土长的、但却感到自豪和相信自己命运的主人公带来了挑战和痛苦。接近出身卑微的人，但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象叛逆者一样憎恨特权阶层的优雅举止、价值观念和不公正的态度，同时，这个土生土长的主人公却又是正直、贤明，难以佯作接受那些被认为是必然的社会准则。他发现在灵魂中，他既是间谍，同时又遭人监视，总是窥视着想象中的伤痕。为自圆其说，他甚至不惜制造伤痕。他发自内心地意识到，他必然要遭受由此而产生的痛苦。因为事实上，这既不是想象中的痛苦，也不是他所亲身经历的痛苦。主人公所遭受的、或者反映在他身上的痛苦，正是作者能感觉到的。作为一个人可能遭受的痛苦，这种痛苦的根源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高人一等的阶层。由

于这一阶层的存在，主人公不可能得到满足，除非一个新的、能够确立他人格的公正世界从地平线上出现。

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他以批判意识和在作品中满怀激情，而又明白无误地抨击了现行秩序而著称。人们也许会把费尔南多·纳莫拉仅仅当作一个令人羡慕的、榜上有名的小说家。但是，当人们细读了他的书——几乎全部都是感情浓郁的自传体小说，就会发现，他那种医生和社会学家特有的犀利目光，以及他如何触及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结构不合理的、虚弱和充满种种企图和梦想的社会要害，都在他那悲伤和具有暴露性的传奇故事中得到了体现。这是关于一个渴望超越自我、追求真实和坦诚的梦想破灭了的人展示他的真实情况，以及所有象他一样的人的真实情况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由于出生在无须为生存大声疾呼的魔圈之外，而属于那个被忽视的种族。

令人不解的是，费尔南多·纳莫拉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不过是进一步向世人揭示了伪装的特征。在这种伪装下面，隐藏着作家唯一根本的意图，即：承认一种更高层次的不受损害。在寻求人类尊严和真诚的前提下，作家寻求另一种方式的不受损害，那种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够赐予我们的不受损害。

然而归根结底，这种追求，如同人们为彻底了解真实的自我进行的所有追求一样，并不在于反映事情的开端和虚构出一种结局，重要的是反映事情的发展过程。在他第一部重要的小说《黑夜中的火光》中，一位年轻的主人公竟然提出要“寻找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用过的圣碗”。这颇具讽刺意味。处在他的时代，这种圣碗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象这样的嘲讽已不复存在，而被讽刺的现实却依然如故。

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同时也在自我探索。医生的职责，在很